

天津港特大爆炸事故后续

国务院调查组负责人：最终报告将向社会公布接受监督 遇难者升至121人 汽车场汽车清理完毕



8月22日，搜救人员在现场工作。

(新华社发)

新华社天津8月22日电 目前，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调查组正在天津开展工作。

问：“8·12”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教训极其深刻。国务院调查组将重点围绕哪些问题开展调查？

答：党中央、国务院对“8·12”事故调查处理工作高度重视。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明确要求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事故原因，查明事故性质和责任，不放过一丝一毫的疑点。

问：国务院调查组已开展了哪些具体工作？

答：调查组设立的5个专项小组，人员现已全部到位，都已制定了具体工作方案，明确了调查的重点、步骤、方法等，并已开展了现场勘查、资料调取、证据采集以及相关物品痕迹采集检验、有关人员查找询问和法律法规制度的研究等工作。

问：事故调查结果何时向社会公开？

答：事故调查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这次事故危害严重、波及面广、涉及

情况复杂，要确保调查结论经得起科学的检验、法律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调查工作既要争分夺秒、全力推进，更要精益求精、保证质量。最终的调查报告将上报国务院，并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接受群众监督。

据新华社天津8月22日电（记者刘林 付光宇 徐壮志 李鲲鹏 华）22日，天津港爆炸事故进入第11天。记者当天在现场目击，核心区南侧汽车物流园中的汽车已被清理完毕。此外，记者从当天举行的第13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2日下午3时，遇难者人数升至121人，失联54人。

记者22日再次深入核心区看到，核心区区内三处冒烟点，有两处呈白烟，一处呈黑烟，另一处冒烟点位于核心区南侧汽车场。该停车场内积水较多，但被炸毁的汽车已被清理完毕。

天津市副市长曹小红在发布会上介绍，目前121名遇难者中已确认身份119人，其中公安消防人员19人，天津港消防人员48人，民警7人，其他人员45人，未确认身份2人。在失联的54人中，包括公安消防人员5人，天津港消防人员32人，民警4人，其他人员13人。

曹小红介绍，目前危重症伤员已由71人下降至48人，151名伤员已康复出院。对符合出院条件并已出院，还需在社区照顾的伤员，按照辖区属地管理原则，由基层医疗机构主动对接，做好出院康复伤员的接续治疗。

就遇难者DNA检测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副主任匡金枝说，目前121名遇难者身源认定工作全部完成。

三部委联合发布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 教科书发行不得搭售教辅材料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记者史竞男）为规范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和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发布关于印发《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的通知。

该办法所称中小学教辅材料是指与教科书配套，供中小学生学习使用的各种学习辅导、考试辅导等出版物，包括：教科书同步练习类出版物，寒暑假作业类出版物，中小学习题、试卷类出版物，省级以上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供中小学生学习、考试辅导类出版物。其产品形态包括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

通知要求，出版单位出版中小学教辅材料必须符合依法批准的出版业务范围，严禁任何形式的买卖书号、刊号、版号和一号多用等违法违规行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负责实施考试命题、监测评价的单位不得组织编写有偿使用的同步练习册、寒暑假作业、初中和高中毕业年级考试辅导类教辅材料。鼓励有条件的单位组织开发供学生免费使用的教学辅助资源。

通知明确，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发行单位不得委托不具备发行资质的部门、单位和个人发行中小学教辅材料；在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中，不得搭售中小学教辅材料。

通知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加强对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的指导，组成中小学教辅材料评议委员会。凡评议推荐的教辅材料应控制内容容量，避免增加学生负担。教辅材料的评议推荐要做到机会均等、过程透明、程序公正；教辅材料编写人员和被评议的教辅材料出版人员不得参加评议推荐工作。

通知要求，中小学教辅材料的购买使用实行自愿原则，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中小学校或学生订购教辅材料。学生自愿购买本地区评议公告目录内的中小学教辅材料并申请学校代购的，学校可以统一代购，但不得从中牟利。其他教辅材料由学生和家長自行在市场购买，学校不得统一征订或提供代购服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学校宣传、推荐和推销任何教辅材料。

据悉，该办法自今年10月1日起施行。

立起军队领导干部好样子 ——将军领队参加阅兵训练即景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记者王玉山 李宜良 王经国）盛夏酷暑时节，新华社记者在京阅兵训练基地实地采访中了解到，50多名将军领队从踏进阅兵训练场那天起，始终与广大官兵同甘苦、共训练，以良好的作风形象带动部队、感召官兵，在训练场上树立起我军领导干部的好样子。

忘记年龄，忘记职务，忘记伤痛

16时许，烈日当空，阅兵训练道上地表温度有50多摄氏度。“狼牙山五壮士”英模部队方队领队、第65集团军军长张海青少将一趋趟来，回正步行进在阅兵训练道上，汗水早已湿透了迷彩服……

作为继三军仪仗队之后第一个通过天安门广场的英模部队将军领队，张海青将此次受阅视为一生的荣耀——当阅兵活动决定用将军领队，张海青第一时间报了名。他说：“阅兵是个新考验，但党中央、习主席一声令下坚决不含糊！作为军长，自己理应站排头、打头阵！”

50多名将军领队平均年龄53岁，最大的58岁。在他们看来，阅兵训练既是忠诚训练，也是作风训练。他们忘记职务、忘记年龄、忘记伤痛，与官兵一起生活、一起训练、一起吃苦，成为训练场上的一大亮点。



“上天能驾机，下海能操舰”的李晓岩少将，担任陆战两栖突击车方队将军领队（前左一）同方队士兵一起训练（7月30日摄）。（新华社发）

不给党和军队丢脸，不在战士面前丢人

队伍行不行，关键前两名。走在方队前列，国人世人瞩目。全体将军领队从普通一员练起，从一举一动练起。

“与十八九岁的受阅战士相比，将军领队年龄大都比他们大出30多岁，无论身体的反应速度、灵敏程度还是体力都有差距。”对将军领队进

行集中训练的上尉教练冯开春说，“但他们纷纷要求我不留情面，高标准，严要求，加班加点、加量加码训练。”

徒步方队将军领队集中训练时，为了站好军姿，他们在手和膝盖部位夹上扑克牌，解决手贴不紧、膝不拢的问题，人人站得衣服湿透；为了练耐力，每次教练要求正步踢够96米就行，他们常常一踢就是200多米，一天要踢好几个来回；为增强下肢力量，提高踢腿速度，他们绑上绑腿，经常是吃饭、开会都戴着……作为将军，除了训练，他

们都还担负着管理所在受阅部队等任务。据了解，集中训练以来，将军们体重普遍减少了10斤以上。

汗洒训练场，心向天安门。天气越炎热，将军领队们要求越严格、训练越刻苦、精神越振奋。

与战士训在一起、苦在一起的将军是最美的

阅兵场上，将军们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带头刻苦训练、带头牺牲奉献、带头遵守纪律，为所有受阅官兵树起了好样子。“与我们训在一起、苦在一起的将军是最美的。”一名战士在阅兵日记中写出了官兵们的心声。

8月8日立秋，百团大战“白刃格斗英雄连”英模部队方队将军领队、第14集团军副政委高伟在训练场上迎来自己52岁生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上世纪80年代入伍的地方大学生干部认为，这次受阅是自己军旅生涯的一次重要“补课”——“补好‘战士’这一课。”

“将军领队走上训练场，就是对官兵最大的鼓舞。将军领队的表率作用动力源，是我们对受阅官兵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生动素材和有力抓手。”阅兵联合指挥部副总指挥、北京军区政委王健说，“目前，受阅部队整体训练水平好于预期、高于同期。”

聚焦胜利日大阅兵

抗战若干难点问题简释

九一八事变是偶发事件吗？

中国东北一直是日本帝国主义垂涎的目标。独占中国东北，是日本实现其大陆政策乃至称霸亚洲和世界战略的第一步。1927年田中内阁上台后，日本加紧了在中国东北的侵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占领沈阳城。

(新华社资料照片)

等手段，企图阻止张学良“易帜”。张学良最终宣布易帜，暂时挫败了日本乘乱武装占领东北的阴谋。

1930年3月，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波及到日本。为转嫁国内矛盾，日本政府大肆叫嚷“满蒙危机”。1929年至1931年夏，日军关东军参谋部先后四次以“参谋旅行团”名

义，到中国东北各地搜集情报，拟定各种侵略方案。日本军部据此于1930年10月提出了解决满蒙问题的“三步走”方案。1931年6月，军部正式确定《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规定在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并加紧战争准备。

在关东军与军部密谋侵略中国东北的同时，日军也逐步完成了在东北的军事部署。1931年4月，将驻日本寒区仙台、适应中国东北寒冷天气的第2师团轮换驻辽；从东京调运榴弹炮置于驻沈阳的日军兵营，并将炮口瞄准东北军北营及飞机场；任命熟悉中国情况的本庄繁于8月1日出任关东军司令官；一直从事筹划进攻东北、主持制定过多份侵略方案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建川美次接任作战部部长。

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认为侵略中国东北的客观条件已基本成熟：英法美等西方大国无暇东顾，国民党政府忙于反共内战，张学良率领部分东北军主力在关内参加军阀混战。日本在做好入侵中国东北的一切准备之后，接下来只是寻找一个借口。日本当局继1931年7月制造万宝山事件之后，8月又利用中村事件大做文章。

九一八事变当晚，日本关东军行动有条不紊，也充分说明了日本发动九一

八事变是经过周密策划和准备的。9月18日22时20分，关东军在柳条湖附近炸毁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曾任张学良顾问的柴山兼四郎的副官今田新太郎，立即以爆炸声为信号，指挥埋伏在附近的日军一部攻击驻北大营的东北军。23时18分，日本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以土肥原贤二（时在东京）的名义向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陆相南次郎拍发电报。这时，在沈阳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用“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命令日本关东军分别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19日零时28分，花谷正又发出第二份电报。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接到电报后当即批准板垣征四郎代发的命令，命令日军按照原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结到沈阳，先发制人，实施中心突破，占领东北三省；同时，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本庄繁将各项命令及战况电告日本军部。19日凌晨3时30分，本庄繁率领司令部人员乘火车赶往沈阳坐镇指挥。19日零时50分，驻沈阳的日军部队兵分三路向沈阳城区进攻。4时45分，驻辽阳的第2师团主力也赶到沈阳加入战斗。日军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至此爆发。（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七七事变是偶然事件吗？

有日本学者认为，七七事变是“偶然事件”。当时，日本虽有侵华意图、有吞并中国的准备，但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日本的战争假想敌是苏俄和美国，对于中国只是希望稳定东北建立满洲国，在其他地方则利用军阀割据的形势逐渐建立傀儡政府、实现控制。这纯粹是一种粉饰侵略、扰乱视听的谬论。

事实上，虽然日本提出以苏联和美国为首要假想敌，并确定了南北并进的方针，但前提条件都是要先打败中国。先征服中国，不仅可解除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战争资源和作战基地。因此，日本在确定用兵计划时，始终把中国作为首要的侵略目标。

1936年上半年，作为日本准备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战略步骤，广田内阁决定加强日本中国驻屯军，扩大其编制，提高其地位，司令官由少将军衔升格为中将军衔，且由天皇直接任命的“亲补职”。新编成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兵力由改编前的1771名增至5774名，兵力增加近3倍。

1936年9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在非法侵占丰台后，即以中国军队驻地为目标，开始进行频繁的挑衅性军事演习。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一次，增加到三至五天一次；演习的时间由白天扩大到昼夜不停；演习用弹则由空包弹发展到实弹。10月26日至11月4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北平西南郊举行秋季大演习，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协同配合，这是以夺取北平外围卢沟桥、宛平城等要点，最后攻占北平为目标的一次预演。

1937年3月上旬至6月中旬，日本军部先后派出6批将领校级军官，前往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战略侦察，为策划全面侵华战争做准备。5月至6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华北的军事演习进入紧张阶段，特别是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一带的演习日益频繁。日本从军事上步步进逼，蓄谋重演九一八事变的故技。

7月7日晚，日方后来虽得知失踪士兵已归队，却仍提出要城内中国驻军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城内再行谈判的无理要求，复遭中方拒绝。日本挑起七七事变后，为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迅速作出对华增兵决定。1937年7月15日至17日，日军参谋本部作出《形勢判断》，制定《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使用兵力时对华作战指导要领》，预定在三

个月内消灭中国中央政权。从七七事变后形势发展可以看出，卢沟桥事变决不是偶然事件和局部冲突，而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必然发展和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卢沟桥事变也不是日本少数军人牵着军部、政府的鼻子走，而是天皇、政府和财阀的共同意志；其全面侵华的“有关出兵、作战的事宜，无一不是依照圣命（天皇的命令）进行的”。（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图为守卫卢沟桥的29军士兵抵抗日军入侵。（新华社资料照片）

四个小时内消灭中国中央政权。从七七事变后形势发展可以看出，卢沟桥事变决不是偶然事件和局部冲突，而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必然发展和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卢沟桥事变也不是日本少数军人

牵着军部、政府的鼻子走，而是天皇、政府和财阀的共同意志；其全面侵华的“有关出兵、作战的事宜，无一不是依照圣命（天皇的命令）进行的”。（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